

## 经济学 管理学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编者按] 长期以来,本刊发表了一些基于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为落实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话精神,本刊从本期开始,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栏陆续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继续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 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程恩富

[摘要] 纵观 20 世纪初以来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不断深化和细化,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重大问题。本文首先回顾和简析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然后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大创新,最后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基本思想。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7) 02-0080-08

纵观 20 世纪初以来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不断深化和细化,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重大问题。本文首先回顾和简析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然后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大创新,最后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基本思想。

## 一、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简析

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一直是西方比较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分析这一学说的演变,有助于汲取西方的科学思想,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在实践和争鸣中不断深化的。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的

---

作者简介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研究员(北京,100732)。

1908年，意大利巴罗内就针对荷兰皮尔逊的观点，论证只要对资源、偏好和生产函数有足够的知识及求解方程的能力，中央机构模拟市场职能，便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奠定了数学和逻辑的方法论基础。接着，1929年美国泰勒推进了遭奥地利米瑟斯批评的巴罗内观点，指出国家在决定公民的货币收入和依据成本定价的前提下，可用“试错法”即根据商品供求状况来校正价格，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值得称赞的是，1938年波兰兰格发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批驳米瑟斯的论点中进一步发展了泰勒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狭义价格即市场价格，只有广义价格即均衡价格，才是经济计算的工具，而确定均衡价格可以运用“试错法”来解决，并不需要去求解千百万个方程组。兰格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以自觉的方式进行决策的社会，提出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在物品分配中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对不同地区劳动力分配中以自由劳动力市场为基础，根据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引人注目的是，1934年勒纳在反驳道布对狄根森的批评时说由于对经济计算的要求，价格和市场不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概念，而被认为能够至少像资本主义交换经济中一样地利用这些手段，而且能够利用得更好。他强调，自由的价格制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精神是符合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和自由价格制度，并在1944年《统制经济学》一书中再次阐发了这些原理。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以泰勒为代表，已经较明确地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内涵。<sup>[1]</sup>

战后，随着南斯拉夫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兴起，许多西方比较经济学家正式提出和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其一，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选择的研究》（1967年）的专著中，美国沃德已经使用“市场社会主义”的词汇。其二，美国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1977年）一书中清晰地指出，尽管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但它们仍有可能按大体相同的方式运行，并称南斯拉夫的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三，1980年美国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比较经济制度学》的著作里写道：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要素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决策权是分散的，由市场机制加以协调；采用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手段促使参与者去实现目标。他们认为，兰格模型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现实变体是合作的或自治的经济。其四，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83年）一书中，英国诺夫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大私有制和有较强宏观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五，1985年美国博恩斯坦在《比较经济体制》的教科书中作了这样的概述：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把下述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前两项和第三项结合起来：（1）集体所有制，（2）收入分配中有限的的不平等，（3）利用市场和价格分配资源和产品。其六，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埃斯特林和格兰德声称“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我们希望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其七，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的定义如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因原苏东国家解体而消亡，反而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罗默和伯克利分院巴德汉分别在《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年）和《市场社会主义》（1993年）的著作中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经济效益，又使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社会平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投资构成纳入计划，而产出构成、价格和劳动力均不纳入计划；国家运用5—20种利率来指导投资；借鉴日本经验，实行公司互相控股以促使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公司利润在纳税后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在所有成年公民中平等分配。

这里，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几点简评：首先，这一理论形成的发展轨迹是：计划模拟市场的纯粹社会主义（巴罗内等）→计划部分模拟市场的半市场社会主义（兰格等）→有较强国家调控

的市场社会主义(诺夫和罗默等)。其次,计划社会主义在理论模型和经济计算方面确实是可行的,但由于现存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的管理素质不适应计划社会主义,因而现阶段只能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社会主义。再次,在20世纪30—90年代赞同社会主义的西方学者中,不少人主张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有较强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模式而部分地加以肯定,这是人类科学思维的进步。最后,包含发展大私有制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推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质上应是一种“法人社会主义”和“劳动社会主义”。这是综合某些西方学者思想精华的科学结论。

##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重大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创新等问题,其中提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其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均以此为中心来构建和创新的,因而必须深化认识和认同。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它不仅在理论上能站得住,而且在实践上能行得好。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系统的创新性。早在1979年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sup>[2]</sup>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江泽民便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sup>[3]</sup>“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sup>[4]</sup>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胡锦涛阐明了“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sup>[5]</sup>针对混淆市场经济的不同经济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误解,习近平明确指出:“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sup>[6]</sup>从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举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逐渐显示出全面的创新性。它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理论为前提,在产权、分配、调节、开放等体制机制方面,在区域发展、新型农村、城镇布局、生态环境、民生改善、人口计划、教科文卫体等发展建设方面,均形成不断发展得较为系统的理论,在人类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创新地位。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学理的科学性。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普遍都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结合是天然的最佳结合,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已改变了这一传统观点,而国外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仍然固执这一教条。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宣称市场经济或市场化只能与私有化相结合。这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说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也就是说,前者涉及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而后者涉及到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的市场与计划(政府或国家)问题。倘若使用“资源配置”一词,那也是前者指资源由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来配置,而后者指资源是由企业,还是有政府来配置,即“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调节(运行)配置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可以与计划经济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也

可以程度不同地采用计划或政府调节的方式。如法国等被西方学界称之为计划资本主义，越南和白俄罗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便是这个逻辑。连西方产权学派的创始人科斯都只能承认，以往只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目前不能被证伪。日本经济学院士伊藤诚曾专门从学理上论证，得出中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行得通的，其关键在于要消除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政策的影响。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实践的可行性。一种理论行不行，不仅要接受理论逻辑的检验，而且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考察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得出，资本主义初期与市场经济是非常矛盾的。而世界体系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则一贯强调，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其实，应该这样准确地表达，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企业和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决策和公平竞争，在资本主义私有垄断寡头控制下，均难以充分实现，或者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性和公平性，与资本的私有性和寡头性内含严重的矛盾性和冲突性的层面。其实践凸显为私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往往存在贫富对立、高失业率、金融危机、对外掠夺等。因此，西方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如美国加尔布雷斯早就揭露美国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含垄断型大公司剥削中小企业的“二元体系”对抗性，因而倡导“新社会主义”，并支持法国和英国等青年师生十年前开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国际改革运动”；法国皮凯蒂在近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世界畅销书，用数百年的大数据揭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财富和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的“世袭资本主义”。可见，被西方实践检验表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不怎么行，存在无法克服的逻辑和应用弊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崭新学说，已被中国3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其国家整体发展绩效和经济公平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状况好得多，这也被国际舆论中广泛使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等赞扬性话语所肯定。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内有学者认为，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完全可以创建出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即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民生社会主义。目前这一新形态在我国完全具备了理论抽象的实践条件。<sup>[7]</sup>诚然，作为新生事物，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是经验不足所致，有些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市不严所致，有些则是受西方不良理论和政策误导所致，亟需在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氛围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从严依法治国，积极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理论、政策、体制、机制和实践各方面的中国式创新来圆满解决。要言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行，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比西方现代西方经济学更科学。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勒纳提出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利用市场手段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因原苏东国家解体而消亡，反而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均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经济效益，又使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社会平等的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不仅没有脱离，而且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借鉴了中外市场经济思想，但总体上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的。<sup>[8]</sup>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克服完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三、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基本思想<sup>①</sup>

<sup>①</sup> 此部分的合作者为黄世坤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主要阐述习近平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基本调节制度、自主开放型经济制度的主要思想。

#### （一）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

习近平说：“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sup>[9]</sup>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期的经济发展来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尤为必要。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坚持改革性质，通过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化改革，两者都体现了公有主体型产权制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发展思想，有利于消除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和负面影响。

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总体思路。把握习近平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必须首先把握其总体思路。总体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前者体现了“战略定力”，后者则需要“问题意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两个“毫不动摇”最初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现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也碰到了一些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还要加强”；<sup>[10]</sup>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sup>[11]</sup>“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sup>[12]</sup>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sup>[13]</sup>

2. 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部署，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的概念，后来又经过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的重要发展。新一届党中央和习近平则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定位上，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论断：一是首次肯定它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二是提出它成为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两大论断对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共同获得发展机会，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认识基础。在参股经济成分的地位与作用上，强调发展公有资本控股为主，也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习近平特别提到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将确保混合所有制真正成为公有主体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因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是，在全社会上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在微观上以公有资本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大发展，并适当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

#### （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sup>[14]</sup>

1. 坚持按劳主体型分配制度的必然性。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生产对分配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分配反过来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只有科学贯彻按劳主体型基本分配制度，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行按劳分配主体型基本分配制度，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的主体地位。而按照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照这些要素的产权关系进行分配，是表象与实质的对立统一。

2. 初次分配改革思想。所谓初次分配,就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作为主体的分配。结合国外和国内现状来看,初次分配都是人们利益关系的根本。它一般占居民收入的80%—90%,再分配只占居民收入的10%—20%(如美国为12.5%)。注重初次分配领域的深化改革,是习近平分配体制改革思想的突出特点,核心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为此,第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怎样实现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中央和习近平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主张。概括起来是四条基本路径:提出要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提出要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适当减少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水;四是继续推进和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第二,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第三,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这有利于实现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收入增长与社会经济增长同步,优化收入分配的区域格局,促进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3. 广义再分配思想。所谓再分配,就是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的分配,以调节初次分配中所没有解决的不公平问题。习近平再分配思想的特点是:既注重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又注重运用社会保障这种重要的再分配形式;既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也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再分配作用;既注重一般物品的再分配,也注重建立公共资源出让的收益合理共享,从而大大拓宽了再分配领域的视界,丰富了政策主张。第一,加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实行托底社会政策。第二,加大和完善税收、价格、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加大再分配。第三,加大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积极推行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

4.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其中,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都是工作重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共同富裕这个渐成“中心课题”的重大难题,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调节制度的思想

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sup>[15]</sup>

1. 双重调节的科学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决定”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总体上它是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只不过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是不同的。一是在宏微观的不同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共同矫正某些“市场决定性作用”。二是在“市场决定”的资源范围上,正确含义是市场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与政府对地藏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与不少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相结合。三是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非物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应与市场的重要作用相结合。

2. 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怎样实现“市场决定”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根据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主要的路径有两条: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完善政府职能。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sup>[16]</sup>可见,应将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放在基础性地位。概括起来,习近平关于构建完善市场体系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完善要素市场体系。第二,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第三,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3.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既不能用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sup>[17]</sup> 怎么能够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解为由“市场决定”呢？片面强调简放政权亦不对。它应是一个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系统工程。核心是建设民主高效的法治政府和为人民服务型政府，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主体性。

简言之，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从法律、经济、行政和伦理等多方面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必然略大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节能力，从而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高绩效。

#### （四）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主开放型制度的思想

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要应对挑战。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在扩大开放中坚持开放的自主性，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

1. 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思路。结合历史、国情与世情变化，我国必须加快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习近平和新一届中央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总纲领。其总体思路主要体现在：第一，关于主要目标，就是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sup>[18]</sup> 第二，关于自主型开放经济新体制的基本路径。第三，关于推进重心，就是要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

2. 构建自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举措。怎样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怎样更好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怎样培育竞争新优势？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综合性战略抓手。一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二是深入推进沿边开放战略。中央已作出加快发展“东南国际经济开放圈”、“西南国际经济开放圈”和“东北国际经济开放圈”等建设。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10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要与东南亚国家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三是加强对外援助，充分展现出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3.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处理好的几对关系。一是独立自主与合作共赢的关系。独立自主的关键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也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sup>[19]</sup>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但一些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各种渗透依然存在，强调独立自主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性。没有独立自主，也就谈不上合作共赢，因为“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sup>[20]</sup> 二是正确统筹自力更生与扩大开放、扩大内需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关系。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滑坡，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只能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支撑，这应当成为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政策方向。三是正确处理相互尊重与聚同化异的辩证关系。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客观上存在各种分歧和摩擦。四是正确处理国际交往中“义”“利”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在出访韩国时明确提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sup>[21]</sup> 这些思想也都大大地丰富了构建开放型国际经济新体系的内涵。

要言之，习近平关于自主高水平开放的基本思想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sup>[22]</sup>

#### [参考文献]

- [1] 荣敬本、刘吉瑞：《比较经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 [3]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 [5]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 [6]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 [7] 文魁：《民生社会主义论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管理学刊》2016年第6期。
- [8] 胡乐明：《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取向、基本原则与未来方向》，《海派经济学》2016年第1期。
- [9][1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 [10] 缪毅容、谈燕：《“三年多没去上海了，看到大家，很亲切”——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侧记》，《解放日报》2014年3月6日。
-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
- [12] 《习近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尽快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人民日报》2016年7月5日。
- [13][22]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华社，2015年11月24日。
- [14]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 [1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 [17] 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 [18] 杜尚泽、赵成：《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将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 [19]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25日。
-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 [21]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责任编辑：张超